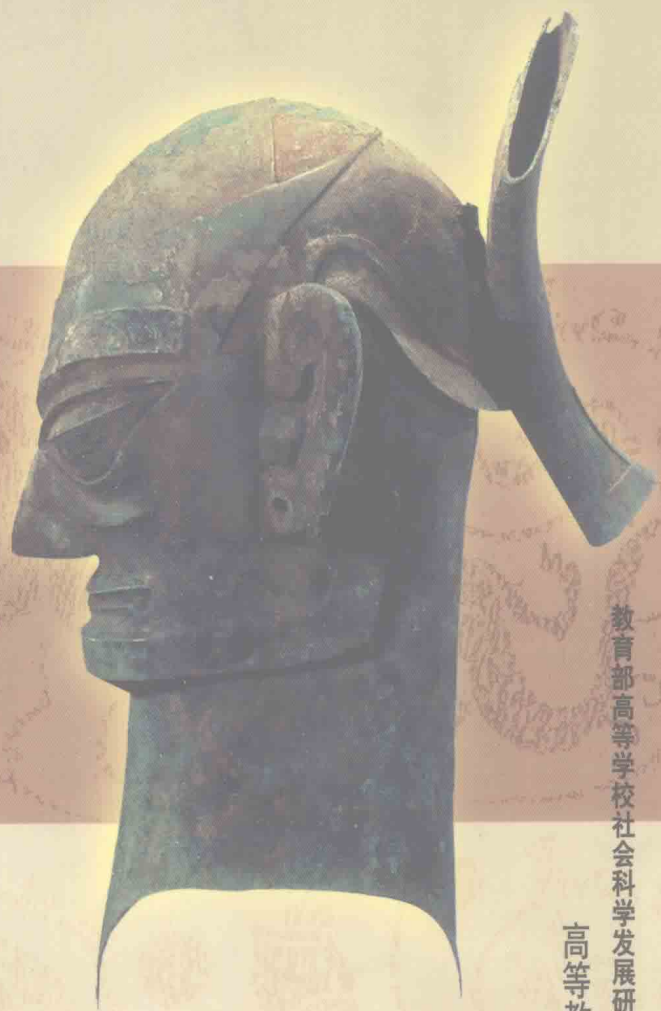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中心 组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教育部组织开展的“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研究与宣传”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书中的8篇专论,分别选取先秦、汉、盛唐、宋和元、明、清等不同时代的哲学、文学等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几个亮点,进行了专题研究和深入浅出的评介。

本书适合于对大学生、中学生进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教育,也可满足一般社会读者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学习的需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

ISBN 7-04-009826-1

I. 中… II. 教… III. 文化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464 号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4.625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0 000	定 价	7.9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序

陈至立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国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把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同积极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结合起来。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辉煌的历史，宣传、普及中

2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成果,阐明它们在古今中外的影响,研究分析这些文化成果的成因,以此来丰富、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文化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制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推进素质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前一时期,教育部组织开展了“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研究与宣传”的课题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几个亮点进行了专题研究,写出了一批文章。这篇文章不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通史,它着重书写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些灿烂的篇章;将有关的文化成果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评价、分析,在深入浅出、集中突出上下了一番功夫。

现在,这篇文章结集出版,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宣传普及,有助于对青少年的思想文化教育。

目 录

陈至立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序 (1)

方立天 先秦哲学:中国古代睿智之光 (1)

韩兆琦 宏阔豪迈的绚丽之花——汉代文学略论 (23)

袁行霈 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43)

刘乃昌 闪光的人格风采和深沉的社会意蕴
——宋代文化概观 (57)

郭英德 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奇葩 (79)

郭英德 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 (99)

刘广和 屈原的人格与诗歌 (117)

卢冀宁 《孙子》和异彩绚烂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127)

后 记 (141)

先秦哲学：中国古代睿智之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方立天

在世界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东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地中海地区逐渐形成了古代三大文明区，相应地，在这些地区又分别形成了被称为世界哲学三大系统的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至前 200 年（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称此为人类精神过程的“轴心时代”），上述文明区出现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文化历史现象：这些地区几乎同时诞生了一批思想巨人，如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又几乎同时涌现出一批有关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经典文献，如中国的《老子》、《论语》、《周易》，印度的《吠陀》（成书更早，约公元前 1500 年）、佛教经典，希伯来的犹太教《圣经·旧约》，希腊的《理想国》、《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等。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成果标志着人类精神文明的巨大飞跃和人类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这些地区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总结了该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经验，阐述了对宇宙、社

2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

会和人生的看法,回答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这是一次人类文化建设的奠基典礼,它不仅确立了不同文明区的文化范型,并且深远地影响了周围地区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不仅奠定了人类的精神基础,并且对人类以后的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 722 年~前 221 年),是古代东亚文明区文化的创新期、奠基期。此时,诸侯争霸,列国交战,一些游说列国的学者纷纷献计献策,谋猷筹划,聚徒讲学,著书立说,诘难争辩,并在战国时代形成了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原创性的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先秦哲学思想独步东亚,在世界哲学之林,别树一帜,蔚为壮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延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古代先哲的智慧为我们研究当前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发掘、弘扬中国先秦哲学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本文拟就先秦时代文化的核心——先秦哲学的形成、内容与意义三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先秦哲学的形成

中国先秦哲学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成因深刻而复杂。自远古以来,中国先民们栖息繁衍于东亚大陆,在这块土地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业,生生不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泱泱大国,东濒茫茫无际的太平洋,西南西北为高原地区,内部腹地纵深宽广,活动天地非常开阔。春秋战国时的地域包括燕山山脉以南、五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面积约 300 万平方公里,后继续开拓为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中华文化

的摇篮涵括了气候适中的黄河中下游,即中原一带,这里是辽阔的冲积平原,古时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长江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温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中国的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决定了农业为古代的主要生产方式。西周时期实行的是集体耕作制,大规模的协作是组织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开始实行牛耕,并使用了铁制的农具,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代,农业生产已发展成为小规模集体耕作制,到了战国时代,更演化为家庭耕作制,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力量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时由宗法贵族分化出各种士,如文士、武士、方士、法术之士、隐者、辩者等。大约在春秋时,这些士就开始成为独立的阶层,至战国时,士的社会地位又有提高。此时魏、楚、齐、韩、秦诸国相继竞用士人,推行变法。如商鞅在秦国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他把大家庭析为小家庭,以增加纳税服役的单位;废除井田,准许土地买卖;奖励耕织,惩罚商贾;按军功大小确定爵位的等级;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举措在当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秦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士还发挥其知识优势,从事教育,培养弟子。殷商西周时代,“学在官府”,学校是官方垄断的官学,贵族巫、史掌管文化教育。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官方对教育的垄断,使古代学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有些君主开始创办文化学术中心,聘任各派大师“不治而议论”,专事讲学争鸣。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吸引四方游学之士,如邹衍、淳于髡、彭蒙、田骈、接子、慎到、宋勣、尹文、环渊、鲁仲连、荀况等,都来此讲学论道,时人称之为“稷下先生”。稷下学派中有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儒家等。此外,鲁国的曲阜、魏国的西河、赵国的邯郸、秦国的雍城、楚国的郢等,也都是当时重要的文化学术中

4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

心。私学的扩大和文化学术中心的建立,促进了齐、鲁、楚、三晋、秦、吴越、巴蜀等文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各地文化学术的繁荣与兴盛。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异常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就天道观、人道观、社会伦理、礼法制度、名实关系等诸问题展开了争辩,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文化学术的发展。因诸子百家多兴起于战国年间,故称“战国诸子”。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其后刘歆又将诸子归纳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并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汉书》卷30《艺文志》,1745页,中华书局,1975)。战国时代,在哲学上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墨三家。当时儒墨并称为“显学”。道家是隐士之学,故不列为显学。对先秦哲学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儒、道学说。老子发现了“自然”,开创了自然主义传统。孔子则发现了“人”,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易经》又把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儒道两家的两个传统,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导向。

二、先秦哲学的内容

先秦哲学的内涵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其最大的主题是对“天人之际”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又侧重于对人际关系和为人之道的阐发,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今就其荦荦大端,分四项作一简述。

(一)“天人之际”

“天人之际”即天与人的相互关系。先秦时代,“天”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1. 自然,指天空、天体,也泛指客观的物质世界;2. 神灵,指天帝或天上诸神。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天”兼具这两种性质,而哲人们则或偏重于以自然论天,或偏重于以神灵意

志论天。究“天人之际”，主要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自然与人为关系为重点。关于自然与人为的关系，先秦哲学主要有“天人合一”、“与天地参”和“天人之分”等学说。

“天人合一”说强调的是天道和天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当时阐发此说的有孟子和庄子等，他们分别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天人合一说。

孟子（约前 372～前 289）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总结了天和天相通的观点。孟子所说的天既是最高主宰，又是最高的必然规律，而他所说的性则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也即善性，而所谓心是指思维器官。孟子认为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能知性，而人们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所以知性也就能知天。孟子强调应当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以求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这就是说，在孟子看来，性与天是相通的，人性与天道是统一的。

庄子（约前 369～前 286）也主张“天人合一”，他所讲的天是指自然，人是指对自然加以改造的人为。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庄子·山木》篇还引孔子的话肯定“人与天一”的命题。在庄子看来，人与天本来是合一的，自然界本来就是和谐、美满的，只是由于人的主观区分和知识技巧，才破坏了天人的统一。他主张“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消除一切人为，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这是一种主张“因任自然”的自然主义说。庄子主张倒回到自然，实是违反了人的本性；而庄子主张不毁伤自然，对文明社会则具有警钟长鸣的意义。

“与天地参”说是在肯定天道与天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

6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

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内容，分别是阴阳、柔刚、仁义。三者属于不同层次，有所区别，又有相应的关系。《周易大传》提出这样的原则：“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系辞下》)，认为人类能够参与自然界的變化。《周易大传》还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象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的命题。“财成”、“范围”，意为调节。“辅相”、“曲成”，意为协助。这是一方面承认自然变化及其规律，一方面又强调通过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周易大传》还认为，一个人做到天人协调，其道德就会与天地相合，从而也就能成就“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第二十二章也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尽人之性”，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意思是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穷尽万物的本性，就能参赞、辅助自然界的變化了。《周易大传》等提出人要参与、辅助自然的变化，使自然发挥对人类有益的作用，而不是征服自然，破坏自然，毁灭自然。这种观点就是主张天人协调，即保持天人的动态平衡。这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辩证的天人关系模式，实成为尔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天人之分”说是强调自然和人为的区别的论说。荀子(约前313~前230)作《天论》，否定天有意志，能祸福人类，认为天只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有其客观的普遍规律，天不能主宰人的命运，与人间的吉凶、祸福、治乱并无关系。《天论》还强调“明于天人之分”，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意思是说天和人各有自己的功能。荀子认为懂得天人之分是最高人格的标志。他还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指责庄子只是一味地歌颂自然而不理解人为的重要意义。荀子重视改造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自然、治理自然的主张。荀子认为“天地者生

之本”，并不否认天和人的联系，主张“不与天争职”，不以人的主观作为去代替自然的客观职能；同时，荀子也反对放弃人为，主张改造自然，利用万物，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荀子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荀子的“天人之分”说与《周易大传》等的天人协调说有其相通之处，但荀子更偏重天和人的区别，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这点又与天人协调说不同了。

应当指出，上述天人关系的三种学说，也并非完全对立，互相排斥。凡主张“天人合一”说的，都以天人有别为前提，而主张“天人之分”的，也并不否认天与人的联系。两说的实质性分歧在于，“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符合天道，回归自然，而“天人之分”说则主张人类要支配天道，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说，则既承认天与人的区别，也承认天与人的统一，并提倡人类要积极参与自然界的變化，以保持天与人的协调，这不仅与“天人之分”说相通，也与“天人合一”说相通。

（二）“群居和一”

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因此正确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群己关系是先秦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探讨的又一重大课题。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相敬爱，和谐共处。先秦哲学人伦之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项：

1. “仁者爱人”。史称“孔子贵仁”（《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仁”是孔子（前551～前479）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孔子说的“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爱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说“仁”是“泛爱众”（《论语·学而》）。“仁”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孔子还提出“爱人”的原则与方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立”，自立。“达”，显达。意思是要推己及人，自己不愿意

的,不要加给他人;自己想自立,也要帮助他人自立,自己要有成就,也要帮助他人去获得成就。孟子也宣扬“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思想,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同上),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爱相敬。孟子还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认为民重于君,君主的仁或不仁,爱民或不爱民,是其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关键。

墨子(约前 468~前 336)提倡“兼爱”,主张爱人如己,实行普遍的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为此在实践上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墨子重视实际利益,他还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不能离开“利人”。他认为一个人奢侈享受,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人人都应当尽力做有利于他人的事。

儒家的仁爱 and 墨家的兼爱,都肯定自己与他人是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应当说,仁爱 and 兼爱两说都闪耀着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儒墨两家学说也有区别。孔子的“仁”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是有等差的爱。墨子则反对儒家“爱有差等”说,强调爱无差别等级,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厚薄的平等的爱。然而,在古代等级社会里,墨子的兼爱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等级差别。事实上,儒墨两家所宣扬的爱都不是真正的平等的爱。儒墨学说的历史命运并不相同。墨家主张“视人之家若视其家”,含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倾向,与封建社会结构不相协调。又儒家重义轻利,而墨家的兼爱则以实利为标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这都导致儒家仁爱思想影响日益增大,墨家兼爱思想影响日趋衰绝的历史格局。

2. “五伦”“十义”。先秦儒家哲人重视维系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保持各种不同人际关系的稳定,重视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地位、价值、权利与责任,重视不同社会角色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

道德规范。孟子继承前人的思想，就“人伦”作了界定：“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长幼”包括兄弟一伦在内。这是对人伦关系的权威性定论，确定了社会的五种人际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五个原则。“父子有亲”，是说父对子应当慈爱，子对父当孝顺；“君臣有义”，是说君主对臣子应当仁爱，臣子对君主应当尽忠；“夫妇有别”，是说夫主外，妇主内，有不同的分工；“长幼有序”，是说年长在前，年幼在后；“朋友有信”，是说朋友之间要诚实守信。《大学》也有与孟子相近的论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讲的国人的范围要大于朋友，而道德准则同是“信”。汉代以后所讲的人伦基本上是继承和绍述孟子的说法，以“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为社会的五种基本关系，后也称为“五伦”。

对于五伦关系中十种角色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礼记·礼运》有“十义”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是规定五伦每一方各自应当遵守的准则，强调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并非像汉代以后那样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

先秦儒家基于等差之爱的思想所提出的“五伦”“十义”，确立了古代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并经过权威化、制度化而成为传统礼教的核心。

3. “知礼以立”。“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通常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三方面内容。孔子重视礼，他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认为必须知礼，才能自立，自立然后才能立人。由此，孔子又把礼和仁联系起来，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强调要克制自己的视听言动，使之符合“礼”，以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认为，对人以礼相待，尊敬他人，是爱人的表现。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实质内容。这也就是

说,知礼是为仁的必要前提,是自立立人的基础。

荀子作《礼论》,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先秦时代礼的学说,强调礼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礼的具体内涵是不断因革损益的,而礼的原则是不变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变而不乱。荀子还提倡礼法兼用,宣扬“治之经,礼与刑(即法),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认为治国既要用礼义教化,又要采用必要的刑罚。荀子的这一主张,对尔后的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4. 以“和”为贵。“和”,原意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经过西周末年至春秋时代的“和同”之辨和儒家的大力提倡,“和”成为当时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普遍渴求和共同理想、价值诉求和价值标准。“和同”之辨的“同”指简单的同一,“和”是多样不同事物的统一。据《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解释“和”的意义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就是会聚不同事物而使之得以平衡、统一。史伯认为,多样事物的平衡、统一,会产生新的事物,相同事物的同一、重复,并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这一深邃的哲学思想影响极大。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把是否追求和谐视为君子区别于小人的思想分野。进而孔子又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强调整个社会的大和谐。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更加鲜明地肯定了“和”的价值。孟子提倡“人和”,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齐心协力,团结合作。认为“人和”比天时、地利更加重要,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王制》还提出“群居和一”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又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

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分”,职分。“义”,道义。荀子认为,人类只有合群,才能避免争斗,才能协调一致,并产生巨大的凝聚力。群居生活要以道义来确定职分,明确了各自的职分,人们就会各守职分而彼此和谐。这样,万众一心,多力而强大,就能战胜一切。

以“和”为价值取向,是基于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而提出的。现实生活里,充满了个人与个人、集团与集团、社群与社群、阶层与阶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矛盾和斗争,斗争的结果或是双方同归于尽,或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或是双方和解而两利。以“和”为贵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为了使斗争的双方不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而是通过互相协调,良性互动,化干戈为玉帛,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以上从人道思想、人伦关系、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实践方式和价值观念诸方面论述了先秦哲学的人际和谐说,这是先秦哲学,尤其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

(三)“自强不息”

先秦哲学重视为人道,强调人格的尊严价值。什么是有崇高价值的人?怎样才能达到和保持理想的人格?这是当时思想家们所热心讨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先秦时代的人格价值学说,主要阐述的是学会如何做人,也就是要正确地对待自己,要妥善处理个体与群体、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道德与生命、人格与生命、死亡与不朽等关系,以求实现人格的完善。

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先秦哲人一方面主张高扬个体独立意志,一方面又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认为平民也有不可强夺的独立的意志。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所谓大丈夫的人格标准,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丧失原则。《礼记·儒行》还宣扬